

Sokrates
oder Die Geburt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苏格拉底 或政治哲学的诞生

Peter Trawny

[德] 彼得·特拉夫尼 著
张振华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502. 231

14

014042024

苏格拉底或政治哲学的诞生

Sokrates oder Die Geburt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德] 彼得·特拉夫尼 著

张振华 译



B502.231
14



北航

C172947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格拉底或政治哲学的诞生/(德)特拉夫尼(Trawny,P.)著;张振华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
ISBN 978-7-5675-1490-4

I. ①苏… II. ①特… ②张… III. ①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政治哲学—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02.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3641号



Sokrates oder Die Geburt der Politischen Philosophie

By Peter Trawny

Copyright © Verla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GmbH, Würzburg 2007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Verlag Königshausen & Neumann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08-775号

苏格拉底或政治哲学的诞生

著者 (德)特拉夫尼

译者 张振华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90 1/32

印 张 7

字 数 163千字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1490-4/B·815

定 价 29.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Καὶ ἔωσπερ ἄν ἐμπνέω καὶ οἶός τε ὦ, οὐ μὴ παύσωμαι φιλοσοφῶν.

只要我一息尚存并且力所能及，我就不会停止哲学思考。

——苏格拉底

以上是这个被诸神认为最智慧的人，被希腊人公认为最有学问的雅典人，苏格拉底，对无知的赞美！如果他今天复活的话，我们的学者和艺术家们能使他改变他的看法吗？不能。先生们，这个正直的人依然会蔑视我们无用的科学。

——让-雅克·卢梭

把这个理念在实践上、也就是为了我们的合乎理性的行为准则来加以充分的规定，这就是智慧学(Weisheitslehre)，而当智慧学又作为科学时就是古人所理解的这个词的含义上的哲学，在他们那里，哲学曾是对至善必须由以建立的那个概念及至善必须借以获得的那个行为的指示。[最后一行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伊曼纽尔·康德

苏格拉底的精神性生活在于，他致力于在与他人的谈话中对如下问题试探：是否他们以及他本人能够在最最不同的生活的问题^①中——无论是最简单还是最复杂的——都保持与自己本身的统一性，是否他们前后一贯，对他们而言在一定程度上不言而喻的东西，对于过一种和自己本身保持一致和同一的生活，是否真的足够，是否这些人真的是他们所以为的那样，是否所谓的统一形象在简单的谈话中早已分崩离析。

——让·帕托契卡(Jan Patočka)

① 原文误植为 Fragen，修正为 Fragen(问题)。——译注

目 录

前 言 / 1

1. 苏格拉底之后政治哲学的要素 / 1
2. 现代政治哲学 / 36

导论 同样是一次申辩: 马克斯·韦伯的划时代演讲《科学作为职业》 / 43

1. 科学与大学 / 47
2. 科学的意义 / 54
3. 智慧之人与科学 / 66

主要部分 政治哲学的诞生 / 76

1. 《苏格拉底的申辩》 / 76
2. 《克力同》 / 152

结论 当今政治哲学: 跋 / 190

1. 自我认识 / 190
2. 政治哲学 / 195
3. 法庭或政治公共性 / 197

4. 政治哲学的任务 / 200

5. 生活的τέχνη[技术]及其话语 / 203

文 献 / 206

译后记 / 214

前 言

1. 苏格拉底之后政治哲学的要素

没有一个哲人像苏格拉底那样将哲学思考以及从这种哲学思考而得到理解的生活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这个看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回忆一位友人如何为被处决的那个人合上嘴巴和眼睛时，斐多说，他是最优秀的人，因为他是最理性、最正义的人（《斐多》，118a）。这不仅是和他的同时代人相比。苏格拉底始终是哲学的关键人物。经由苏格拉底，哲学对自己能够意味着什么给出了理解。哲学之意义——苏格拉底的思想、生活以及死亡。

经由苏格拉底理解哲学，这首先意味着，在哲人的思想与行动中观察他本人，并对他的形象严肃以待。事实上，哲学并不仅仅表现在它当然是至关重要的理论中，它还更多地显现在哲人的生活，也就是哲学性的生活里。当尼采说，他“喜欢上一个哲人，只是就他能够提供一个榜样而言”时，他言之有理^①；这个“榜样”就是思想以

① 弗里德里希·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即《不合时宜的沉思》第3篇。参见尼采，《考订研究版尼采全集》（*Sämtliche Werke. Kritische Studienausgabe*）（转下页注）

及源于思想的行动的“榜样”。苏格拉底是所有此类“榜样”的原型。

当我们考察苏格拉底的思想与行动时，一种特定的哲学观就此展开自身。这种哲学的特点在于，它触碰到城邦的根本利益，如果不说摇撼了城邦的话——其目的是在这种摇撼当中对城邦加以改善。苏格拉底亲口说：他教给听众的是他们应该关心自己本身和城邦本身（《苏格拉底的申辩》，36c）。苏格拉底的哲学思考的核心乃是自我认识（Selbsterkenntnis）以及对真正的政治的关心。当然，哲学中的这两个要素并非毫无关联地互相并置在一起。我会在稍后尝试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

苏格拉底的哲学因此是一种“政治哲学”（Politische Philosophie）^①。我们权且可以说，如此这般的哲学就是政治的，亦即，哲学作为哲学在自我反思时认识到，哲学将之把握为它所寻求的事情本身的东西，涉及处于某个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政治哲学因此既非政治科学亦非政治理论（politische Theorie）。后者的任务是对有关政治或者政治之对象的特定理论与知识进行研究与管理。政治哲学使得政治共同体以及它如何在一种极为周全的意义上得到最好的总体组建径直成为了问题。当我同意列奥·施

（接上页注）[简称 KSA]，乔尔乔·科利（Giorgio Colli）与马志诺·蒙提那里（Mazzino Montinari）编，第 1 卷，DTV u. De Gruyter；慕尼黑，柏林与纽约，1980 年，第 298 页。——原注

中译参见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258 页。——译注

① 我遵循海因里希·迈尔（Heinrich Meier）的这一书写方式。他在 2000 年所作的慕尼黑就职演讲“为什么是政治哲学？”（海因里希·迈尔：《为什么是政治哲学？》（*Warum Politische Philosophie?*），Metzler；斯图加特与魏玛，2000 年）一文中，对政治哲学在多大程度上与有关政治的哲学及理论（Politische Philosophie und Theorie）有所区别作出了概述。迈尔的论说与列奥·施特劳斯在 1954 年与 1955 年之交的耶路撒冷演讲“什么是政治哲学？”（列奥·施特劳斯：“什么是政治哲学？”（*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载于《什么是政治哲学及其他研究》（*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other studies*），Greenwood Press；Westport，1959 年，第 9—55 页）相关。——原注

特劳斯的看法,将苏格拉底理解为第一个政治哲人时,对政治哲学的这一规定就构成了其他进一步特征的基础。

除了这一规定之外,我们需要同时指出,政治哲学并不是有关政治事物的纯粹理论,这仅仅是因为,对于政治哲学已经得到证实的事情是,政治事物反映在哲人的思想与行动中。实践哲学同样也不能只被理解为一种有关正确行为的理论。如果这一前提成立,政治哲学就是对实践哲学的一种特定阐释。如同康德就“智慧之人的理想”(Ideal des Weisen)^①在多个地方详加阐述的那样,道德哲学的要求不可避免地会转而针对哲人本人的实践活动。对政治哲学同样适用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式的思考会依据自身而对哲人本人产生实践上和政治上的后果。

再有,源于一种政治哲学的生活,不只是政治哲学所牵涉的诸多事物中的一个,相反,生活契证了政治哲学在理论上所包含和主张的内容。苏格拉底最感兴趣的事情仿佛就是这种契证(Bewahrheitung)。当他在与克力同的对话中认识到,所有那些他迄今为止对之投以精力的人,面对哲人所身处其中的艰难处境,似乎已经背弃了曾得到经年探讨的东西时,他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是否这一切不只是一场儿童游戏(《克力同》,49b)。一种未曾转化为实践,因而在(哲学性的)生活中没有留下痕迹的哲学思考,是一种不需要严肃对待的消遣。政治哲人知道,他的思想对他人就像对自己本人一样,具有一种实践和政治的涵义。他因此哲学化地生活着。政治哲学在一个政治哲人身上得到具体体现。随着这种知识——这种自我认识——政治哲学启程了。

在这一启程中,对知识与理性的某种理解表现了出来,我们必须着眼其独特性而对这种理解加以检验。我们将会指出,苏格拉底

① 参见我的论文“知识的理想:论康德那里哲学与哲人的关系”(Das Ideal des Wissens. Zum Verhältnis von Philosophie und Philosoph bei Kant)。该文拟2007年刊发于《康德研究》(Kant-Studien)。——原注

的对话在一个重要领域内与其他的理性计划有所区别。通常的看法认为,在 ἐπιστήμη [知识] 中有理性的沉淀物,而在 δόξα [意见] 中有的则是无论怎样都低于理性的认识形式。我认为这必须得到商讨。恰恰是对知识的某种现代理解,必须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 σοφία [智慧] 面前做好防御,不要采取一种简单的区分模式。这种区分模式尤其会十分普遍地使人们接受一种连续的知识史的叙事——这种叙事歪曲了柏拉图的文本。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人们常常错误估计了这样一件事情的影响,即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而言,知识是一种极其复杂的 ἀρετή [德性]。知识乃是德性 (Tugend)。这一点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人们应当更长久地盘桓于这一思想,因为这一思想不单重要,而且至少同样地稀罕。从这一思想出发,我们就不能认为,“西方”具有或者说建基于一种“科学”的历史连续性^①。柏拉图那里的 ἐπιστήμη [知识] 乃至 σοφία [智慧] 所具有的意思,与当今被称之为“理论”的东西几乎毫无干系。

任何一种以哲人苏格拉底为对象的解释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苏格拉底没有留下文字,我们必须使用柏拉图、色诺芬以及阿里斯托芬的著作^②。然而,是否存在一个独立于柏拉图或色诺芬的苏格拉底,这个问题在我的思考语境中并不紧要^③。当我们援

① 在德语中,“科学”(Wissenschaft)与“知识”(Wissen)词根相同,前者是对希腊词 ἐπιστήμη 的通行翻译。与此通行观念不同,本书作者强调现代的“科学”与希腊的 ἐπιστήμη 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译注

② 另可参见奥洛夫·纪贡(Olof Gigon):《作为问题的苏格拉底形象》(Die Gestalt des Sokrates als Problem),载于《历史的苏格拉底》(Der historische Sokrates),安德烈亚斯·帕策尔(Andreas Patzer)编,WBG: Darmstadt,1987年,第270—322页。这一纲要尤有助益。——原注

③ 参见索伦·克尔凯郭尔,《〈哲学片断〉最后的非科学性附言》I,全集第16卷,埃马努埃尔·希尔施(Emanuel Hirsch)与哈约·格德斯(Hayo Gerdes)编,杜塞尔多夫与科隆,1951年起,第196页:“苏格拉底本质性地强调生存(Existieren),而柏拉图则遗忘了这一点,迷失于思辨之中。”这是一个无益的区分。即便是“强调生存”的苏格拉底也只是一个柏拉图式的苏格拉底。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来否认,像《巴门尼德》之类的特定对话无法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原注

引柏拉图和色诺芬的特定描述时，哲人苏格拉底会渐渐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我并不想对其英雄史作出一番讲述，也不想对他进行史学式的理解。“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兴起本身，是政治理性的化身。我们的确可能并不知道“现实的”苏格拉底在多大程度上与柏拉图和色诺芬的描述相一致。我们遵循在那些文本中可以找到的描述。

我对作为一个政治哲人的哲人苏格拉底的解释，基于对柏拉图文本《苏格拉底的申辩》以及《克力同》的阐释。其他对话则按需要进行引征。色诺芬的《苏格拉底的申辩》及其《回忆苏格拉底》始终附随着这个解释。它们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这些视角对理解政治哲人苏格拉底大有裨益。



在自我认识中反思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的哲人，了解这样一回事：他的哲学思考围绕着与城邦生活相关的问题而展开。因此，哲人之为哲人的自我认识与政治哲学是共属一体的。这种由苏格拉底的形象得到保证的关联构成了对政治哲学式的思考进行更进一步规定的基础。因此，政治哲人就与一个意义重大的位置（Ort）相关。这个位置不仅仅是城邦，同时也是贯穿着城邦的法庭。法庭——这个概念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包含一个死后的涵义^①——指向法律（Gesetzte）。法庭在城邦的中心保证了这些法律。与这些法律相关的是它们的来源问题，即习俗或自然中的法（Recht）^②的来源。在这一语境中，涌现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法庭、

① 指冥界的法庭与法律，见本书后文讨论。——译注

② 这个词有法、法权、正当、合理等多种含义，对应英语的 right，我们在翻译中随语境处理。——译注

法律以及法的总体活动空间似乎不可避免地关联到神性者(Göttliche)。如此这般得到理解的哲人的位置,就是保证着法律的法庭,因为作为实际上的城邦成员,他的政治地位就是这样一种有着统治与迫害(Herrschaft und Verfolgung)的区分的政治地位。统治与迫害的区分在获胜或者失败的言辞(Rede)中表现出来。位置(1),法庭(2),法律(3),神性者(4),统治与迫害的区别(5), λόγος[言辞,逻各斯](6)——这是政治哲学的要素,它们源于政治哲人苏格拉底自我反思着的思想与行动。接下来我将对它们进行更为确切地解说。

(1) 汉娜·阿伦特曾写道:“我们不能给一个哲人确定位置——一个跟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的人——我们只能给行动本身确定位置。”^①给哲人“确定位置”是不可能的,苏格拉底本人表达过这一思想。他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说,对公民们而言,他乃是一个 ἄτοπον[无位置者](31d)。^②这个设想中的无位置状态看上去和柏拉图的思想是相符的。在《斐多》中苏格拉底甚至断言,只有从肉体中解放出来的灵魂才可能看到真理本身——在感性渴求与跳动的脉搏的彼岸,在高天的位置,一个不同寻常的、无位置的位置。这似乎就是哲人的位置。斯多亚的世界主义(Kosmopolitismus)引出的结果是:哲人四海为家,这意味着他无处为家。

然而,对苏格拉底的这种阐释即便在语文学上并没有错,那也是过于简单化了。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明确地意识到,哲人有

① 汉娜·阿伦特,《1950—1973年思想日记》(Denktagebuch 1950—1973),乌尔苏拉·卢兹(Ursula Ludz)与英格博格·诺德曼(Ingeborg Nordmann)编,Piper;纽约与慕尼黑,2002年,第749页。——原注

此处所引阿伦特的原文为英文。——译注

② 可参见格诺特·伯梅(Gernot Böhme)的阐释《苏格拉底类型》(Der Typ Sokrates)(令人遗憾的是,这本著作在相当多的地方失之浅薄),Suhrkamp;美茵法兰克福,1988年,第19页。——原注

一个位置。就某一方面而言,与智术师截然相反,他的思想活动在某个位置上发生,所以他的整个思想活动都围绕着这个位置。柏拉图在《蒂迈欧》中(19e)说,智术师在他们流荡的生活中无法去相应地理解政治事物。苏格拉底的这个位置就是雅典城邦。首先是雅典的广场(Agora),其次是诸如市民的家宅、竞技场或统治场所,即普吕坦内安(Prytanaion)等其他地方。如果说苏格拉底以无位置的方式思考与生活,那么他就一直处在与一些特定位置的张力当中。实际上,只有与一些特定位置相联系的人,才能声称自己是无位置的。苏格拉底的的确确在城邦之中,正如他同时也是无位置的。

然而,将 ἄτοπος 翻译为“无位置的”就已经是成问题的。ἄτοπος 的意思是奇怪的,荒谬的,或许可以说是疯癫的^①(参见《克力同》44b,那里提到了一个 ἄτοπον ἐνύπνιον, 一个奇怪的梦)。因此,苏格拉底可以被简单地看作一个怪人,一个打乱城邦常规的人。无论如何,这样说有很多理由,而本书的目的之一就在于表明,政治哲人必然呈现为一个不在局中的人,一个陌生者。

于是我们发现,ἄτοπος 这个词的用法绝非总是贬义。阿尔喀比亚德指出,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当代人或古代人中找到,除非人们像阿尔喀比亚德本人那样,将苏格拉底与西勒诺斯、萨图尔们乃至怪诞的生物相比。阿尔喀比亚德似乎是在以此称颂苏格拉底的奇特(《会饮》221d; οἷος δὲ οὐτοσὶ γέγονε τὴν [这样一个人很奇特])。一个人的 ἀτοπία 是一种令人产生矛盾情感的特征。我们必须注意是谁做出了这种判归。无论如何,阿尔喀比亚

① 此处“疯癫的”(ver-rückt)一词是一个双关用法。其形容词词义为“疯癫的、不合情理的”,而如果看作是动词 verrücken 的第二分词形式,则意为“被挪出位置的”。这个双关用法正反映了希腊文 ἄτοπος 的结构。希腊文 ἄτοπος 一般译为“不同寻常的”,但从字面上讲,这个词由 τόπος [位置]加上否定性前缀 ἄ- 组成,故其本意为“无位置的”。——译注

德是被哲学所触动的人,而多数人并非如此。

因此,哲人绝非是无位置的,他同样也不像阿伦特所认为的那样是普通人。不过,女哲人评论说,哲人的行动、他的哲学思考,拥有一个位置,这却是正确的。这一位置正是哲人的位置。

哲人不可能是普通人,因为他的特征与哲学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并非人人都愿意接受的后果从哲人生存中产生。这些特征与后果同哲学的位置拥有关联,但我们显然不能因此说,哲学思考的位置规定了哲人所思考或者不得不思考的事物。当康德将哲人称为一个“了解智慧的大师”^①时,他没有提及这种认识的位置。然而,这样一个“大师”的位置从他的知识当中产生出来,于是我们可以说:不仅在一个人所思考的内容当中昭示了他身处何处,我们也可以从他身处何处来认识他思考的内容与方式。为何康德就像他的先行者苏格拉底一样,一直逗留在同一个位置?谁如果将这个问题边缘化,谁就是在将对哲学的追问边缘化。

位置在这里总是首先指一个生活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各种要求,有时是法的要求,总是与一个位置联系在一起。卡尔·施米特在这个意义上一度创造了“位置创建”(Ortung)的概念。位置创建就是“对法进行奠基的原初—行动(rechtsbegründende Ur-Akt)”^②。创建一个城邦是与对一种特殊法权的创建联系在一起的,并因而与对每一种特定的权力结构的合法性证明相联系。在

① 伊曼努尔·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霍斯特·D·勃兰特(Horst D. Brandt)与海纳·F·克勒梅(Heiner F. Klemme)编,Felix Meiner:汉堡,2003年,A195。——原注

中译参见《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6页。——译注

② 卡尔·施米特,《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之法》(*Der Nomos der Erde im Völkerrecht des Jus Publicum Europaeum*),Duncker & Humblot:柏林,1997年4月,第16页。——原注

对蒂翁维尔^①著作的指涉中,施米特写道:“与吕克昂和学园的辩证法不同,它[有关 *Topoi*(位置)的学说]是公开场所、广场的辩证法。一个人能够对另一个人说的东西,只有在正确的框架范围与正确的位置上才是值得讨论、可信并具有说服力的。于是即便在今天也还有必不可少的布道坛与讲台、法官席与竞选大会、会议与代表大会、影院与广播电台的 *Topoi*[位置]。每一种对这些各不相同的位置的社会学分析,必须以对它们各不相同的 *Topoi*[位置]的描述为开始。”^②一种“社会学分析”同我们并不相干,但哲学拓扑学(Topologie)的确包含一个社会学环节。因此,每一个位置都有赖于它的“位置创建”。生活世界的位置“总已经”是权力位置,在这些权力位置上,一个人可以言说并且被倾听而另一人却不能。自行进行“位置确定”是一个创造并安排各种要求的事件,所以法庭——比如苏格拉底不得不在其面前进行申辩的法庭——就是一个典范性的位置。现代大学是进行特殊的“位置创建”的一个更加广阔的位置。

苏格拉底的位置是城邦。他说道:对他而言重要的事情,除了自我认识之外,就是城邦本身(《苏格拉底的申辩》,36c)。当然,这里的音调实际上听起来是柏拉图式的。对政治哲人而言,这似乎涉及城邦的理念(*Idee*)。这诚然是对的。然而,这没有免去如下一个问题:对苏格拉底这个哲人而言,他到底在什么地方同这种理念产生关联。如果他同城邦本身有所关联,那么他就同时与此时此地活生生的雅典城邦有关。即便政治事物的真理不

① 欧仁·蒂翁维尔(Eugène Thionville)1855年在巴黎出版并于1983年再版的著作标题是《论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中的公共场所理论:以及此理论由古及今所承受的主要变化》(*De la Théorie des Lieux communs dans les Topiques d' Aristote: et des principales modifications qu'elle a subie jusqu' à nos jours*),Vrin:巴黎,1983年。——原注

② 施米特,《欧洲公法的国际法中的大地之法》,前揭,第21页。——原注

可能被任何现实所驳倒，哲人的最后关注仍然落脚在城邦上。当苏格拉底为了与斐德若(Phaidros)在伊利索斯(Ilissos)河边的梧桐树下谈论爱欲(Eros)而离开城邦的围墙时，他也就离开了他的哲学思考所归属其中的位置。这样一种弃离位置的行为可能恰恰与爱欲性的事物相应。而引人注目的是，接下来的爱欲神话把这种弃离位置的行为延伸到了极端，直至发生骤变。不过，即便是这一弃离位置的行为也首先要从它的位置，从城邦获得意义。我将指出，古代的政治哲人如何严肃地考察爱欲，将其视为原则上解除稳定的力量，对秩序产生威胁的东西，亦即反政治的东西。这意味着，爱欲的弃离位置的冲决，始终涉及先前的“位置创建”。^①

对于哲人需要位置，在位置上出场，霍布斯已经在其《利维坦》中有所记述：

当雅典人打垮了波斯军队，获得了海上的统治权，因而获得了爱琴海中欧亚两洲的一切岛屿和沿海城市的统治权，并渐次富裕起来以后，在国内和国外没有工作的人便没有旁的事情可做，而“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见《使徒行传》第17章，第21节圣路加语）或是公开向城邦中的青年讲哲学。每一个老师都找一个地方来讲学。柏拉图所找的是某个称为学园(Akademia)的公共场所，这名称是由一个名叫阿卡德摩(Academus)的人而来的，亚里士多德则在潘神(Pan)的庙廊中，称为吕克昂(Lycœum)学派，另一些人则在画廊(Stoa)下，也就是在商人落地售货的廊下。另一些人则在另一些地

① 参见色诺芬的《斯巴达政制》以及柏拉图的《法律》。因此，爱欲性的事物同政治之间存在张力，这是必然要指出的。离开了能够将其暴力性地超越或打破的秩序，爱欲可能就不是它自身了。在哲人的无位置的生存与爱欲的这种特质之间可能存在联系。——原注

方教导或讨论他们的意见来消磨他们的闲暇。还有些人则不拘地点,只要能把城中的青年招在一起听他讲话就行。加尼兹(Carneades)在罗马当使者时也像这样做,因而使得伽图劝告元老院赶快把他打发走,恐怕青年们喜欢听他的高论(他们认为如此)而使品行败坏。^①

霍布斯提到了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实践并由亚里士多德所把握的思想,即哲学始于日常需求的必要性发生终止的地方。哲学要求 σχολή, 闲暇, 一段自由的时间。在雅典的政治地位得到发展并增强之后, 城市变得富庶, 雅典可以为一些特定的人提供这种闲暇。这样, 各种不同的“位置”就能够形成起来。柏拉图的学园、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等地方, 就是哲学思考所需要的那种闲暇、自由的时间的位置。而这些位置全都处在“伟大而繁荣的城市”^②。因为这些城市能够将一些人从在经济方面至关重要的领域内解放出来。

与这些实情相联系的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学考察。哲学的第一位置是城邦, 这一点说出了某些关乎哲学之特征的东西。处在城邦当中的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哲学的涵义能够从哲学在城邦中所占据的身位得到测度。霍布斯同样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记述道, 伽图吩咐罗马元老院对加尼兹的公开露面和言谈加以控制。而霍布斯本人不也终其一生处在类似的境遇中吗?

对学园和吕克昂的提及证明了哲学在何种程度上都需要一

① 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Dent,伦敦,1962年,第364页。——原注

中译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0页。译文略异。——译注

② “闲暇是哲学之母,而国家则是和平与闲暇之母。首先有繁荣的大城市的地方,就首先有哲学的研究。”参见霍布斯,《利维坦》,前揭,第364页。——原注

中译参见霍布斯,《利维坦》,前揭,第539页。——译注